

■学人素描

王东京:与官员谈中国经济难题

◎刘朝阳

拿破仑曾经讲过:聪明但喜欢走捷径的人,最好去当将军;又聪明又勤快的人,让他去当参谋;不聪明、爱偷懒的人,可以去当传令兵;但勤快、愚蠢的人,最好什么也别让他做。

“在现代社会中,如果按拿破仑的说法对号入座,那么经济学家应该努力去扮演‘参谋’的角色。”王东京这样给自己定位。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系毕业后,他一直在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从事教学工作。现在,他已记不清自己是多少次站到讲台上,为前来学习的中高级党政官员讲中国经济学,讲中国经济的现状与未来。

掌握经济理论, 掌握一个支点

阿基米德曾经说:给我一个支点,就能转动地球。如果把经济活动比作地球,经济政策比作杠杆,那么经济理论就是撬动“地球”的支点。“主管经济工作的党政官员,天天与政策打交道,或是制定政策,或是执行政策,如果没有掌握必要经济理论,很容易弄巧成拙。”王东京说。在经济学家和党政官员之间寻求一种有效的沟通,是他近年来致力探索的课题。

经济学中有一个资本收益递减规律,王东京用经济学家的眼睛来看,发现政府制定的经济政策,效应也是递减的。“经济生活不像物理实验,它的变数太多,几乎无法控制。比如1998年以前,治理通胀是主要任务。谁料中国这边‘着陆’未稳,就爆发了亚洲金融危机,接着是一场大洪水。原来的经济过热,一下子变成了需求不足。问题变了,政策当然得跟着掉头;否则,无异于南辕北辙。”

政策的效应递减,还体现在执行程序上。国家制定政策,考虑的是整体利益。但政策到了基层,每一个地区,每一个企业,都有自己的一本小账。两笔账能算到一起固然很好,但很多时候,根本就算不拢,这就难免有政策,下有对策。经济学上管这叫博弈。“面对这种情况,国家要想实现自己的意图,就得出新招,出奇招,不能让对手摸到路数。像程咬金那样老是三板斧,肯定是不行的。”

评价一项政策好坏,必须让实践说话。但单纯由实践来判断,难免会成“马后炮”。王东京打了一个比方,“一个人置身沙漠中,哪个方向能找到绿洲,哪个方向是死路一条,



他必须事先就做出定夺。绝不能不管三七二十一,随便走下去,走对了是万幸;一旦搞错了,自己就会埋尸黄沙。果真如此,实践的代价岂不是太大了?”

王东京认为,让经济政策随机应变,扬长避短,在实践中发挥作用,就必须学习一些经济理论。近年来,他撰写出版的《与官员谈西方经济学》、《与官员谈中国经济》、《与官员谈经济政策》、《与官员谈经济学名著》、《与官员谈西方经济史》、《与官员谈现代金融》、《与官员谈财政税收》、《与官员谈中国改革》等,一改传统经济学研究的沉闷传统,用随笔的形式,把复杂深奥的经济学原理,描述得生动活泼,在国内党政官员中引起强烈反响。文化部副部长孟晓驷形容王东京“就像一个导游,引领我们走进这片中国现实经济问题的丛林,其中既有山重水复的困惑,也有柳暗花明的惊喜。在困惑和惊喜的转换之间,我们领略了王东京教授深入浅出、厚积薄发的功力。”

三个假定,三个原理、三个方法

有人说,经济学如此复杂,各种学派多如牛毛,对同一个问题,三个经济学家,可能拿出四种答案,你让我听谁的?今天的经济学,千头万绪,令人生畏。一不小心,就可能迷失在这片丛林里,不知道自己已从哪儿来,要到哪里去,别说用它来分析

问题,就是弄清原委,都可能茫然失措。但这绝不是说,经济学是屠龙术,如果我们善于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把它最本原的东西梳理出来,你就会发现,基本的、管用的理论其实并不多。”

王东京说的“基本的、管用的理论”,是基于这样两个原则:道理简单,容易理解和掌握;经得起实践验证,能得到普遍接受。“不论经济学多么庞大,假如用以上两个原则去过滤一番,能剩下的东西,充其量不过一掌之数。”王东京认为,现代经济学里,真正基本的、管用的理论,就是三个假定、三个原理。

三个假定是:经济人假定,把人看作是理性的利己主义者。资源稀缺假定,强调市场经济要合理配置资源。保护个人产权的假定,充分发挥个人劳动效率。与此对应是三个经济学原理,利润最大化原理,既然后人是自私的,必然就会谋取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供求原理,既然资源是稀缺的,就必定存在供求关系问题。等价交换原理,既然保护个人产权,就必须实行等价交换。运用上述假定和原理分析经济问题,还需要三个方法:即成本收益分析法、均衡分析法以及帕累托标准。

“这几条,简单得令人吃惊,但却是经济学智慧的结晶。一般人和经济学大师的差别,说到底,就在于会不会使用这些假定和原理?熟练程度如何?推断功力怎样?经济生活千变万化,而经济理论万变不离其宗,只要把握了它,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就都具有了看家的本领。”

在王东京看来,纷繁复杂的现代经济学体系,其实就是根据三个假定、三个原理、三个方法构造起来的。比如,从经济人假定出发,根据利益最大化原理,运用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就形成了生产规模理论;从资源有限的假定出发,根据供求原理,运用均衡分析方法,就形成了市场价格理论;从保护个人产权出发,根据等价交换原理,运用帕累托标准,就形成了按要素分配理论。

“它就像中国的八卦,一旦组合起来,就会博大精深、变化无穷。孙子兵法,说起来只有三十六计,但要运用得好,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它需要兵家审时度势,用计准确,方可得胜。作经济分析也是如此,我们必须先弄清经济问题产生的背景与条件,选择恰当的理论与方法,做出合乎逻辑的推理与判断,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

十年专栏,十部文集

经济学家既然要当“参谋”,

就要研究现实、服务现实。在讲课和行政工作之余,王东京密切关注着社会经济问题。他经常不辞劳顿地深入厂矿企业乃至偏僻的山村进行调查研究,或与各地的党政官员、企业家广泛接触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在此基础上确立自己的选题。

时下CPI上涨,成为全国消费者最关注的问题。人们担心CPI上涨会带来通胀,引发通货膨胀?王东京为文写道:近期CPI上涨是由于肉禽供应减少,属于商品短缺,而不是通货膨胀。在供大于求的买方市场上,商品价格主要由买方决定,物价全面上涨的可能性不大。

与一般学者不同,王东京把目光投射到在这场争论中一个沉默的主体——农民。“农产品比价低,农民不富裕,不是农业天生弱质,更不是农民不勤劳。相反,是为了保证城市供应需要,农民做出了巨大的牺牲。现在农产品价格适度上涨,农民有了增收的机会,说农产品不能涨价就是偏见。”

王东京的博客更新很快,当很多学者批评全民炒股时,王东京却

说全民炒股有何不好;当中美战略对话就汇率问题再次发生争议时,王东京疾呼要守住人民币汇率;当政府对民间融资加紧控制时,王东京建议对民间融资网开一面;当中国经济迅速冲进全球化的浪潮时,王东京提醒不能过度依赖国际市场。

王东京在媒体写了十年专栏,出版了十本文集,所论主题不同,行文风格却一贯。不装腔作势,不故弄玄虚,不说违心话,王东京多年来始终坚持自己的学术操守。他这样阐释自己的定位,“中国经济正在转轨,必会引起各利益主体的博弈,社会矛盾交织,山重水复,困难重重。面对这些难题,政府有意广开言路,多听意见;而学界中人,自然不该袖手旁观。”

一部经济学说史,就是一部经济学家关注现实、改造世界的历史。王东京下决心在这条路上坚持到底,“中国的经济学家,要在曲折反复的经济改革中,拿出顶风冒雨的勇气,舍我其谁的气概,秉承经济学的传统,真正肩负起经济学的历史使命。”

■本期人物话语



中国经济发展没有过快而是偏快

谢伏瞻(国家统计局局长)日前撰文指出,要正确认识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中央在过去四年多出台的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是及时、必要和正确的,并取得了积极成效。从全面的观点、发展的眼光和综合的视角看,当前经济形势总体上是好的,呈现出“增长较快、质量效益提高、结构协调性增强、群众实惠增多”的良好发展态势。所以,目前中国经济的运行应该是正常的,中国经济发展没有过快而是偏快。

■多声道

调整政策不是取消加工贸易

魏建国(商务部副部长)日前在接受《人民日报》记者采访时指出,调整政策不是要取消加工贸易,恰恰是为了更好地发展加工贸易。禁止和限制“两高一资”产品及加工水平低的产品加工贸易,完善准入管理,推进加工贸易梯度转移,是落实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有利于缓解当前能源紧张、环境问题突出和资源相对短缺等矛盾,符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要求,有助于我们抓住全球资本重组、产业转移的机遇,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有助于提高中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水平,实现我国外贸进出口平衡发展。所以,转型升级对我国加工贸易企业而言,既是压力,也是机遇。必须抓住机遇,向更高技术含量、更大增值环节和自主品牌发展,在全球化的国际竞争中占据先机。

宏观调控首要任务:严防经济由偏快转向过热

朱宏任(国家发改委经济运行局副局长)7月25日在国家发改委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发布会上指出,下半年,发改委将继续稳定和不断完善宏观调控政策,遏制高耗能、高排放和产能过剩行业的盲目发展,将继续实施宏观调控,并且坚持把防止经济由偏快转向过热作为当前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同时,加快研究制定及实施有利于节能减排的经济政策,稳妥推进资源环境价格改革,加大电力、钢铁、有色、建材等行业淘汰落后产能力度,建立有效的落后产能退出机制,加快发展循环经济,推进有色、建材等行业余热发电和资源综合利用。

美股大跌是市场正常波动

保尔森(美国财政部长)7月26日接受彭博电视台采访时说,美国股市当天的大跌不过是反映了市场的正常波动,同时这种波动也在可控范围内。市场总会有波动,股市的大幅下挫显示了投资者正重新对投资风险进行评估。但股市的动荡并不会失控,因为美国整体经济仍保持着健康运行。引起股市大幅震荡的美国房地产市场正在进行“非常重大的调整”,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走出困境。对于次级贷款危机,美国也需要更长时间才能消化处理。

房地产印花税增收不可持续

金人庆(财政部部长)7月23日在大连市举行的全国财政厅(局)长座谈会上指出,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达到26117.84亿元(增长30.6%),但上半年财政收入增长中存在不少一次性、超常规和政策性因素。上半年,工业增长特别是一些高耗能行业增长迅速,带动相关增值税超常增长。受货币信贷投放和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带动,相关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也大幅增长。另一方面,房价涨幅仍然偏高,受此影响,上半年地方房地产相关税收增收占地方一般预算收入总增收额的比重达到26.6%。此外,股市火爆带动证券交易印花税大幅增长,但这些一次性、超常规和政策性因素带来的增收是不可持续的,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当前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经济学术思潮追踪

产业融合研究: 边界模糊化和经济服务化

梁怡

“产业融合”(Industrial Convergence),指的是在经济全球化、高新技术迅速发展的大背景下产业提高生产率和竞争力的一种发展模式和组织形式,它是产业内在发展规律在实践中的具体体现。

“Convergence”(融合)的理念最早由美国学者罗森伯格(N. Rosenberg)在阐述“Technological Convergence”(技术融合)这一概念时提出。在罗森伯格于1963年发表的Technological Changes in the Machine Tool Industry: 1840-1910(《1840-1910(美国)机械制造业技术变迁》)一文中,仔细梳理了美国机械制造业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的演进过程;他发现,一个独立、专门化的机械设备的建立是以用技术长期以来在众多无关或相关产业中的应用和发展为基础的,他把这个由于通用技术在无关或相关产业中长期应用和发展而导致一种生产完全不同和独立产品的产业产生的形成过程叫做“Technological Convergence”(技术融合)。这被学界看作是产业融合思想的源头。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在世界范围内迅速发展和扩散,一些建立在传统工业经济时代生产分工基础上的产业边界渐渐模糊,在原产业边界处开始融合,生成新的产业类型,这使几百年以来一直以亚当·斯密分工思想为基础的产业理论受到极大挑战。

学术界对产业融合的讨论,最早围绕因数字技术出现而导致的产业交叉而展开。1978年,麻省理工学院(MIT)媒体实验室的创始人尼古拉斯·尼古路虎特(Nicholas Negroponte)用三个重叠的圆圈来描述计算、印刷和广播三者的技术边界,认为三个圆圈的交叉处将成为成长最快、创新最多的领域。

以此为起点,各方学者们不断以信息与网络传输行业为基础,来尝试界定产业融合。例如,20世纪80年代,哈佛大学的阿奈特奥尼·欧丁格(Antaony Oettinger)与法国两位作家Nora和Miac分别创造了“Compunctions”和“Telemetriqu”两个新词,以反映数字融合的发展趋势,并把信息转换成数字后,将照片、音乐、文件、视频、对话通过同一终端机和网络传送及显示的现象称为“Digital convergence”(数字融合)。欧洲委员会在1997年发布的绿皮书(Green Paper)中认为,产业融合是指“产业联盟和合并、技术网络平台和市场的重合”,并提出电信、广播电视和出版三大产业融合不仅仅是技术性融合,更是涉及服务以及商业模式乃至整个社会运作的一种新方式。1997年,美国学者Greenstein和Khanna针对计算机、通信和广播电视业的融合,从产业变动的角度提出新说,认为产业融合是为了适应产业增长而发生的产业边界的收缩或消失。而同在1997年,美国学者Yoffie将融合定义为“采用数字技术后来各自独立产品的整合”,他的判断是,企业若实现融合必须采取全新的技术战略和企业发展战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拉古拉杰·拉詹(Raghuram G. Rajan)于2000年又提出,产业融合从根本上是指那些数字技术允许传统的和新的通讯服务(无论是声音、数据或图片)通过许多不同的网络共同传送的现象。

显然,以上学者对产业融合的解释仅仅立足于信息通讯业,因而可被认为是狭义的“产业融合”。而实际上,除了发生在信息通讯领域,产业融合还广泛存在于其他领域,因而还须从广义角度加以揭示。

在日本,学者植草益2001年从动因的角度把“产业融合”定义为通过技术革新和放宽限制来降低行业间壁垒,加强各行业企业间的竞争合作关系,并提出产业融合不仅出现在信息通讯业,金融业、能源业、运输业的产业融合也在加速之中。植草益还进一步预测说,在制造业,产业融合也将得到进一步发展。

随着在学术研究领域与世界的接轨,中国学者近年在产业融合的研究上也颇有建树。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周振华教授认为,产业融合意味着传统产业边界模糊化和经济服务化趋势,产业间新型的竞争协同关系的建立和更大的复合经济效应。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的聂子龙、李浩认为,所谓产业融合是指不同产业或同一产业内的不同行业相互渗透,相互交叉,最终融为一体,逐步形成新产业的动态发展过程;同时在这一过程中还会发生既有产业的退化、萎缩乃至消失的现象;产业融合不是几个产业的简单叠加,而是新产业与传统产业的融合。

从上述对“产业融合”这一范畴的众多界定中可以看出,虽然学者们各有侧重,但本质上看来,其实他们都基于一个共同认识:产业融合是一种全新的经济现象;产业融合的发展态势已广泛影响到世界产业的走向,必将重塑全球产业的结构形态。

相信随着产业融合现象的日益普遍化,学者们对产业融合现象的理解也必将多视角,且愈来愈深刻。

■慕尼黑随笔

美国涨薪:全球将要发生通胀吗

◎梁雨霞

美国最近宣布,在全美境内,把最低工资待遇提高到每小时5.85美元,涨幅幅度,每小时70美分,明、后两年,将分别再涨70美分,这是十年来的第一次全国涨薪。

一般情况下,如果发生薪金普调的事情,可以表明,通货膨胀已经或者将要发生,或者正在局部发生。美国宣布加薪,以及其加薪的节奏,在当前的局势下,显得颇为耐人寻味。看起来,美国人似乎对物价上涨的幅度做过预期,而美国的宏观经济形势,处于一种可以测算和控制的状态。

为什么要提高最低工资的水平?粗略归纳,可能有以下的考量:

第一,通货膨胀已经局部发生。伊拉克战争之后,石油价格一路上涨,而美元日趋疲软。能源价格的上扬,首先带动了资源性的物价上涨,继而传递到其他的半成品与成品。生产成本的提高,导致了生活成本的提高。

第二,一般日用品的价格上涨,对富人来说,是不敏感的,而且,富人掌控产品的供应,上游的价格上涨,可以传递给下游的消费者。政府需要安抚的,是选票集中,把一块美元当十块化的下层的劳工阶层。这部分人群,容易受冲击,但“摆平”他们的人均成本也是最小的。

第三,美国把明后两年的加薪计划提前宣布,仿佛是给社会,尤其是下层人群打一针镇静剂。可以判断,作为权宜之计,美国作好了暂时终结强势美元政策的打算,这种情况,大约还会持续两三年。

第四,给底层加薪,其实是一个可进可退的措施。美元如果能提前找到适当的机会,随时会反弹。这样,给底层的加薪,就算是政府送给穷人的一个小礼包。花费不多,对于弥合社会贫富差距,提高政府形象却一定会好处。

第五,政府的加薪措施,是属于主动引导,还是被

迫因应物价上涨,含义完全不同。如果宏观经济形势不好,就业率下降,提高了的最低工资,反而会成为就业的门槛,哪怕是穷人自己,都会不领情。不是失业增加,就是社会录用黑工的情况增加,反而增加社会管理的成本和死损失。美国的此番加薪,似乎是混合型的。

第六,从国际形势来看,美国的加薪,预示着美国政府对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开了绿灯。美国的通货膨胀,有一箭双雕之效:除了顺应石油涨价带来的一连串物价上涨的因素之外,还可以抬高所谓的“外国国家资本”进入美国的门槛。

需要指出的是,一样是物价上涨和工资上调,中国与美国却不同。中国的通货膨胀,是一种“类通胀”,也就是说,人民币对内贬值,对外却在升值;美国是“真通胀”,至少,暂时是这个情况,也就是说,汇率在下降,而国内真的发生了通货膨胀。

“类通胀”不值得窃喜,如果主动权不在自己手里,或者,节奏控制得不好,“真通胀”也不值得焦躁,如果这是一种相机行事战略。

有意思的是,通货膨胀与加薪,也在欧洲发生着。7月2日以来的德国铁路罢工,现在进入了一种打持久战的状态。火车司机为什么不依不饶地罢工呢?

这是因为,德国这两年日子很好过,绝大多数行业的收入都增加了,尤其是制造业,加薪幅度最大。德国铁路难得地盈利了,物价上涨了,员工的工资却踏步不前,这是德铁大罢工的由来。

德铁的其他两个工会,争取到的加薪幅度是一次性发给600欧元,外加从明年1月起4.5%的薪水上调,到2009年1月底截止。

火车司机工会提出的加薪幅度是至少加31%,能否成功,让我们拭目以待。

全球大加薪,分析其动向、幅度、区间和行业,毫无疑问,对研判通货膨胀、经济政策和金融走势,是很有价值的。